

新序詳註

〔汉〕刘向编著 赵仲邑注

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



中华书局

新序詳註

〔汉〕刘向编著 赵仲邑注

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序详注/(汉)刘向编著;赵仲邑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17.9

(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

ISBN 978-7-101-12737-9

I.新… II.①刘…②赵… III.①笔记-中国-西汉时代②《新序》-注释 IV.K234.1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0011 号

-
- | | |
|-------|---|
| 书 名 | 新序详注 |
| 编 著 者 | [汉]刘 向 |
| 注 者 | 赵仲邑 |
| 丛 书 名 | 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231 千字 |
| 印 数 | 1-3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2737-9 |
| 定 价 | 38.00 元 |
-

前 言

谈到汉代的散文,《新序》是值得介绍的一本散文集。

《新序》为汉刘向编著,从汉代到现在,大家都无异议,只有唐司马贞《史记》《商君列传》《索隐》说“《新序》是刘歆所撰”。

“歆”应是“向”字之误。虽则刘歆在成帝“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1],《新序》的编著,刘歆也可能参与其事,但《汉书》《艺文志》、《刘向传》,《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都说《新序》是刘向“所序”,所著或所撰;同时在《新序》《杂事》第四中也有“臣向愚以《鸿范传》推之”的话:知为刘向所编著无疑。

据《汉书》《王子侯表》及《楚元王传》、《刘向传》,刘向是楚元王交的四世孙,字子政,原名更生,历事宣帝、元帝、成帝。至成帝时,才改名向。年七十二卒,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王先谦《汉书刘向传补注》引钱大昕曰:“依此推检,向当卒于成帝绥和元年。”即公元前八年。据此则当生于昭帝元凤二年,即公元前七十九年。

刘向所处的时代是汉帝国由宣帝的中兴走向哀、平的衰亡的过渡时期。武帝时“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宣帝在民间长大,即位以后,用更多选贤良,但汉帝国的危机还是挽救不了。至于元、成两代,宦官外戚,交相用事,那就更不必

说了。元帝宠任宦官弘恭、石显，以恭为中书令，显为太仆。“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2]对于仇视他反对他的人则进行狠狠的打击和报复。为元帝所器重曾为元帝太傅的名儒萧望之和当时以研究《易经》著名的京房都死在他的手上。刘向是汉之宗室，忠于汉政权。元帝初元二年正月，刘向为散骑谏大夫，和前将军光禄勋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以恭、显弄权，商议请求元帝罢退恭、显，语泄，反为恭、显诬告而下狱，望之被赦，堪、向免为庶人。七月，元帝再度起用萧望之、周堪、刘向。堪、向用为中郎；元帝器重望之，想用望之为相；都为恭、显等所仇视。刘向便托他的亲戚替他上书，说当时的地震和恭、显在位有关，应予罢退。恭、显查出又是向之所为，向因此再度被捕下狱，免为庶人。这年弘恭病死了，石显为中书令。初元三年，元帝又用周堪为光禄勋，张猛为光禄大夫，和石显的矛盾当然要继续发展下去。到了永光元年九月，石显因忌惮堪、猛，屡次在元帝面前诋毁他们，刘向虽然被废，但这时还是支持堪、猛，上书希望元帝任贤退不肖，当然更引起石显对他的憎恨了。永光四年，猛为太中大夫，被显诬告，令自杀于公车门。向为此依托古事，作了《疾谗》、《擿要》、《救危》、《世颂》等八篇作品，以哀悼自己和他的同类。一直到成帝建始元年，石显罢免，刘向才再被任用，拜为中郎，领护三辅都水，不久迁为光禄大夫。但成帝又以帝舅王凤辅政，以凤为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河平二年，封凤弟谭、商、立、根、逢时为侯，世谓之五侯。王氏代汉的局势，由此形成。河平三年，诏令刘向领校秘府内的经传诸子诗赋。向因王氏权位太盛，于是编著《洪范五行传论》，把上古以来下至秦、汉的符瑞灾异和政治得失联系起来，献给成帝，希望成帝感

悟。成帝看了也明白刘向的用意，但始终不能剥夺王氏的大权。虽然离刘氏政权的崩溃还有一段时期，但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了。正在这期间，刘向编著了他有名的《新序》、《说苑》和《列女传》。

《汉书》《艺文志》说“刘向所序六十七篇”，班固自注说“《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但没有说成书于何年。《新序》成书的年代有三说：《资治通鉴》卷三十一以为在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十六年）六月，所根据的大概是《汉书》《成帝纪》和《刘向传》。因《成帝纪》说永始元年立赵氏即赵飞燕为皇后，而《刘向传》则说“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但在同一个时间编著完了三部书是不可能的。马总《意林》引《新序》说“《新序》三十卷，河平四年（即公元前二十五年）都水使者谏议大夫刘向上言”。但刘向编著《新序》时做光禄大夫，不是谏议大夫；可知《意林》所引的这句话也不是原书所有，因此说《新序》成书的年代在河平四年也未必可靠。铁华馆校宋本《新序》每卷的开头都有“阳朔元年（即公元前二十四年）二月癸卯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上”二十二字。虽然不能证明是否即刘向《新序》原书所有，但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五及《玉海》附刊《汉书艺文志考证》卷五也说《新序》“阳朔元年二月癸卯上，《说苑》鸿嘉四年三月己亥上”。《玉海》所引《中兴书目》《杂家》也说《新序》“汉阳朔元年刘向撰”，《说苑》“汉鸿嘉四年刘向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卷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零九《经籍考》三十六也说《新序》“阳朔元年上”，《说苑》“鸿嘉四年上”。则成书的先后，和《汉书》《艺文志》所说“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的次序相符，同时也没有《意林》所引《新序》的矛盾，因而此说也最可靠。但三说都说《新序》成书的日期是在河平三年刘向开始典校秘书以后，这点是相一致的。至于他开始编著《新序》的年代，似乎也不能早在河平三年以前，因为编著《新序》所根据的材料广博得很，他在典校秘书以前不可能全部搜集得到。

《晋书》《陆喜传》：陆喜说“刘向省《新语》而作《新序》”。陆贾《新语》和刘向《新序》的政治思想是相一致的，都希望人君怀仁仗义，崇俭爱民；举贤能，退谗佞；省刑罚，薄赋敛；正身以化民，见妖而修德。陆喜所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但应该说《新序》是刘向在河平三年开始典校秘书以后至阳朔元年，受了当时主要是他曾经经历过的宣、元、成三代的社会现实的刺激，才对陆贾《新语》的政治思想有所感悟而编著出来的。他和《新语》在政治思想上一脉相承，但它的思想内容比《新语》丰富得多。

从《新序》中刘向所编选的故事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以及刘向自己对故事的评论看来，可以体会到刘向非常关心刘氏政权。刘向认为人君要对人民宽厚仁爱。《杂事》第四《梁尝有疑狱》章，说梁国曾有疑难的讼案，不知怎样判决，找陶朱公来帮忙，“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当狱。虽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径相如也，其泽相如也；然其价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径与色泽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侧而视之，一者

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狱疑则从去，赏疑则从与，梁国大悦”。刘向接着这样评论：“由此观之，墙薄则亟坏，缙薄则亟裂，器薄则亟毁，酒薄则亟酸。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国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他认为人君只有爱民，反过来才能得到人民的敬爱。《杂事》第一《卫国逐献公》章：“良君将赏善而除民患，爱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因此他在《杂事》第五《汤见祝网者置四面》章和《周文王作灵台》章中歌颂了商汤和周文王的仁厚。汤教张网捕鸟者“解其三面，置其一面”，“德及鸟兽”。“周文王作灵台，及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令吏以衣棺更葬之”，“泽及朽骨”。对人就更不必说了，因此天下归心。他也批判了梁君的狠心。《杂事》第二《梁君出猎》章：“梁君出猎，见白雁群，梁君下车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谓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群骇。梁君怒，欲射行者。”他的御者说他“无异于虎狼”。他认为在政治上很好的策划是需要的，但不能离开对人民宽厚仁爱这一个基本原则。他在《善谋》第九《秦孝公欲用卫鞅之言》章中说：“故仁恩，谋之本也。”

对人民宽厚仁爱的具体表现，也就是省刑罚，薄赋敛。在《节士》第七《晋文公反国，李离为大理》章，李离认为刑罚的执行，应该是“宁过于生，无失于杀”。这也是刘向对人君的希望。在《善谋》第九《秦孝公欲用卫鞅之言》章，他认为秦孝公相信商鞅的话“更为严刑峻法”，“其患流渐，至始皇赤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在《杂事》第五《颜渊侍鲁定公于台》章，颜渊对鲁定公说：“舜工于使人，造父工于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尽其马。是

以舜无失民，造父无失马。”相反的例子则是中行氏。《杂事》第一《赵文子问于叔向曰》章：“赵文子问于叔向曰：‘晋六将军孰先亡乎？’……对曰：‘中行氏之为政也，以苛为察，以欺为明，以刻为忠，以计多为善，以聚敛为良。譬之其犹鞴革者也，大则大矣，裂之道也，当先亡。’”

要减轻人民对赋税徭役的负担，统治者也就必须降低自己的生活享受。因此刘向在《刺奢》第六中，对穷奢极侈、荒淫无耻的生活，给予了有力的批判或讽刺。《桀作瑶台》章：“桀作瑶台，罢民力，殫民财，为酒池糟隄，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纣为鹿台》章：“纣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他们结果都弄到众叛亲离。《赵襄子饮酒》章说赵襄子喝酒喝了五天五夜不停止，还自诩为“邦士”，优莫却拿他和纣相比，因为纣喝酒能够连喝七天七夜。另一方面，刘向则热情地歌颂了能够崇俭爱民的贤君：《邹穆公有令》章：“邹穆公有令：食鳧雁必以粃，无得以粟。于是仓无粃而求易于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为费，请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仓之粟，移之于民，此非吾之粟乎？鸟苟食邹之粃，不害邹之粟也。粟之在仓与在民，于我何择？’邹民闻之，皆知私积与公家为一体也。”

刘向对于战争一般说来是坚决反对的。在《杂事》第五《田赞衣儒衣而见荆王》章，田赞讥刺楚王说：“今大王万乘之主也，富厚无敌，而好衣人以甲，臣窃为大王不取也。意者为其义耶？甲兵之事，析人之首，剖人之腹，堕人城郭，系人子女，其名尤甚不荣。意者为其实邪？苟危害人，人亦必危害之。苟虑危人，人亦必虑危之。其实人甚不安。之二者，为大王无取焉。”刘向借此说明了战争从名、

实两方面来说都有害无益。战争的祸害，在《杂事》第五《魏文侯问李克曰》章中说得更加深刻：“魏文侯问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数战数胜。’文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刘向以为最好是防止战争的发生。如《杂事》第五《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间而轼》章写魏文侯因为礼贤敬段干木，使秦国“案兵而辍不攻魏”。刘向在故事后面加上了评语说：“魏文侯可谓善用兵矣。夫君子之用兵也，不见其形而攻已成。其此之谓也。野人之用兵也，鼓声则似雷，号呼则动地。尘土充天，流矢如雨。扶伤举死，履肠涉血。无罪之民，其死者已量于泽矣。而国之存亡，主之死生，犹未可知也。其离仁义亦远矣。”如果战争已经发生了，他认为应该使战争赶快结束。《善谋》第十《酈食其号酈生》章：酈生说汉王曰：“楚汉久相持不决，百姓骚动，海内摇荡，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愿陛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天下诸侯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刘向肯定酈生的善谋，和酈生这种计划能使汉王早日结束战争这点有关。当然刘向对于战争也不是无原则地一律反对的；像《善谋》第九《晋文公之时》章所说的晋文公率师勤王，平定了周室的内乱，由此以成霸业，《秦惠王时》章所说的秦惠王因蜀乱而起兵伐蜀，有禁暴正乱之名，有广国富民之实，像这样的战争刘向是予以肯定的；同时在《杂事》第三《孙卿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章和《善谋》第十《孝武皇帝时，大行王恢数言击匈奴之便》章中通过孙卿和韩安国的话也谈到用兵之术。

缓和人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解决或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刘向以为主要的责任要靠最高的统治者人君肩负。但他也认识到光靠人君一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杂事》第五《君子曰》章：君子曰：“天子居闾闕之中，帷帳之内，广厦之下，旃茵之上，不出檐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贤左右也。故独视不如与众视之明也，独听不如与众听之聪也。”因此他要求人君进用贤能。在《杂事》第二《昔者唐、虞崇举九贤》章中，他认为尧、舜、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齐桓公、秦穆公、吴王阖庐、燕昭王、汉高祖等圣君贤主，其功业的成就和用贤是分不开的，反过来虞公、吴王夫差、燕惠王、胡亥、项羽的失败也和不能用贤分不开。要怎样才能用贤呢？人君只要礼贤下士，贤士一般便会乐意跟他合作了。《杂事》第三《燕易王时国大乱》章：郭隗对燕昭王说：“今王诚欲必致士，请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走燕。”但用贤的问题也是很复杂的。因为贤能和谗佞彼此不能相容，人君要不相信谗佞而始终信任贤能也很困难。《杂事》第二《魏庞恭与太子质于邯郸》章：“魏庞恭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来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因此在《杂事》第二《甘茂，下蔡人也》章中，甘茂虽然尽忠竭智为秦拔取韩之宜阳，打通秦国向东发展的道路，但在伐宜阳五月而宜阳未拔时，秦武王还是听信了樗里子和公孙子的谗言，召回甘茂，想就此罢兵。宜阳攻下以后，秦武王死了，秦昭王终于听信樗里子、公孙子的坏话，害得甘茂待不下去。因此刘向接着感慨地说：“故非至明，其孰能毋用

谗乎！”刘向希望人君能进贤能，退谗佞。像《杂事》第四《昔者齐桓公出游于野》章所说，郭君就是因为“善善而不能行，恶恶而不能去”而弄到亡国了。但所用的是否贤能，人君也不易辨别，所喜爱的往往似贤而其实非贤。在《杂事》第五《子张见鲁哀公》章，子张对鲁哀公的讽刺真是一针见血：“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拖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今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以见君。七日不礼，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因此刘向在《杂事》第二《昔者唐、虞崇举九贤》章中说：

“人君莫不求贤以自辅；然而国以乱亡者，所谓贤者不贤也。或使贤者为之，与不肖者议之；使智者图之，与愚者谋之。不肖嫉贤，愚者嫉智，是贤者之所以隔蔽也……然其要在于己不明而听众口。”

既然是不是贤能不好辨别，那么提出什么样的人才 是贤能就非常必要了。因此刘向在《新序》中以大量的篇幅提出一系列的忠良之臣和才智之士而加以歌颂。像孔子的以德化民，关龙逢、比干的直言敢谏，孙叔敖的恕，石奢的直，邹忌的敏捷，屈原的忠贞，柳下惠的诚信，公孙杵臼、程婴的侠义，申包胥的爱国精神，苏武的民族气节，季札的仁德和信交，乐毅的明智和宽厚，赵文子的好学受谏、知人善任、大公无私，晏子的习礼明诗、怀仁仗义、礼贤下士，子产对舆论的听取，宋就对邦交的敦睦，孟献子的以养贤为富，子罕的以不贪为宝，子渊栖、仇牧、田卑、易甲、屈庐、王子闾、庄善、陈不占、长儿子鱼、弘演等的义勇，管仲、狐偃、烛之武、司马侯、伍子胥、司马错、黄歇、虞卿、陈恢、韩信、赵厮养卒、酈食其、张良、娄敬、齐

内史、韩安国、主父偃等的智谋，刘向都予以热情的歌颂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正是具有这种品质或才智的人才能成为人君可靠的有力的助手。但为什么像《节士》第七《原宪居鲁》章中“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的原宪这样的高士也予以歌颂呢？那是因为他希望人君尊敬这些高士，以便在政治上发生良好的影响。譬如《杂事》第五《齐桓公见小臣稷》章：齐桓公去拜访小臣稷，“五往然后得见。天下闻之，皆曰：‘桓公犹下布衣之士，而况国君乎？’于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

刘向继承了儒家的思想，在《新序》中对儒者也极力推崇，《杂事》第五《秦昭王问孙卿曰》章是最明显的例子。《汉书》《艺文志》也把《新序》列为儒家的著作。因此他品评人物的才德也主要以儒家的伦理观点为根据。他在《节士》第七《卫献公太子之至灵台》章中批评卫献公太子“为一愚御过言之故，至于身死，废子道，绝祭祀，不可谓孝”。在《申徒狄非其世》章中批评申徒狄因非其世，负石自沉于河说：“廉矣乎！如仁与智，吾未见也。”在《鲍焦衣弊肤见》章中批评鲍焦因污其君而立槁死于洛水之上说：“廉夫！刚哉！夫山锐则不高，水狭则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与天地疑（拟）者其为人不祥。鲍子可谓不祥矣。”在《善谋》第九《虞、虢皆小国也》章中批评向晋献公提出假途灭虢之计的荀息“非霸王之佐”，而是“战国兼并之臣”。但《新序》也掺杂有纵横家的思想。在《善谋》第九、《善谋》第十中，刘向也肯定了战国游说之士黄歇、虞卿等及汉代类似战国游说之士如酈食其、张良等的智谋，那也是时代使然。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他们“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

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这也就是刘向辨别贤能的另一个根据。

人君应该任用的，按照刘向的意思，只须是根据儒家的观点和实际的作用所确定下来的贤能。其他的条件是不必计较的。行年七十的楚丘先生、年仅十八的闾丘印，都是贤能。只要是贤能，夷狄甚至是仇人也都可以用。《杂事》第三《齐人邹阳客游于梁》章：

“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晋文公亲其讎而彊霸诸侯，齐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用贤也不要求全责备。《杂事》第五《甯戚欲干齐桓公》章：齐桓公知甯戚“非常人”，想任用甯戚，“群臣争之曰：‘客卫人，去齐五百里，不远，不若使人问之，固贤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问之恐其有小恶，以其小恶，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难全，权用其长者。’”

《新序》中的作品以历史故事为主，甚至说《新序》是一部历史故事集也未为不可。所编选的作品不是历史故事的很少，每个故事后面刘向所加的评语也很简单，有些甚至没有评语。刘向根据历史事实或故事传说所作的综合叙述则更少。绝大部分都是小型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作者不可考。譬如《杂事》第二《靖郭君欲城薛》章的故事，也见于《韩非子》《说林下》，但不能说故事的作者就是韩非。这些故事有很多如果联系其他载籍所记载的相类或相同的故事来比较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集体性、口头性和变动性。往往是同一个主题，同一个故事的类型，其人物和情节有所变动。至于语言，那就更不必说了。譬如《杂事》第一《晋大夫祁奚老》章：

晋大夫祁奚老，晋君问曰：“孰可使嗣？”祁奚对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雠耶？”对曰：“君问可，非问雠也。”晋遂举解狐。后又问：“孰可以为国尉？”祁奚对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对曰：“君问可，非问子也。”

《左传》襄公三年作：

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雠也。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

《国语》《晋语》七作：

祁奚辞于军尉，公问焉，曰：“孰可？”对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择臣莫若君，择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从令，游有乡，处有所，好学而不戏，其壮也，彊志而用命，守业而无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镇定大事；有直质而无流心；非义不变，非上不举；若临大事，其可以贤于臣。臣请荐所能择而君比义焉。”公使祁午为军尉，殁平公，军无秕政。

《吕氏春秋》《去私》作：

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雠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雠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

《史记》《晋世家》作：

悼公问群臣可用者，祁奚举解狐。解狐，奚之仇。复问，举

其子祁午。

以上情节不完全相同，语言和表现方法更相差很远，但人物则除了《吕氏春秋》的晋平公和《史记》的晋悼公不同外，其余都没有变动。至《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所载，则人物也几乎全变了：

中牟无令，晋平公问赵武曰：“中牟，三国之股肱，邯郸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谁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门。”公又问曰：“中府之令，谁使而可？”曰：“臣子可。”

根据故事中的人物、情节和语言的变动性，同时也就可以看出它的口头性和集体性了。同一个主题，同一个类型的故事，如果一开始就在书面上固定下来，那它是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别的。分明它是在某些人的口头上流传。故事的讲述者对别人讲述这故事的时候，不能把故事的人物、情节和语言原封不动的保存在自己的记忆里，因而只能根据自己的才能无意地给予删改或补充；或者，虽然记住，但由于某一种企图或由于想把故事说得生动一些而有意地给予删改或补充；因而故事从内容以至于形式就有了很大的变动了。这故事被编选进《史记》里面，由于“世家”这种体裁的限制，当然曾被《史记》的作者加以压缩。所有被编选进《新序》里面的故事，也可能经过刘向加工。但即使是这样罢，由于故事是集体创作的，同一个主题、同一个类型的各个不同的故事，都凝结着故事讲述者的智慧。这些在《新序》里面被加工过的故事，那也还是集中了故事讲述者的智慧而改写出来的。

由于故事的口头性和变动性，其内容不一定符合于历史的事实。如昭奚恤是楚宣王时人，叶公子高、令尹子西是楚昭王、惠王时

人，司马子反是楚共王时人，但在《杂事》第一《秦欲伐楚》章中，他们却在秦使者的面前同时出现。乐王鲋是晋大夫，楚康王时人，但在《杂事》第四《叶公诸梁问乐王鲋曰》章中却和叶公诸梁即叶公子高对话。这在故事、传说中是可以容许的。全祖望《经史问答》《答卢镐问》《大学楚书》条因此批评刘向大抵根据“道听涂说，移东就西，其于时代人地，俱所不考”。那是由于没有辨别故事、传说和史书性质不同，把对史书的要求硬加到故事、传说头上的缘故。

对于这些故事，既不能以对史书的要求来要求它，也不能以对小说、戏剧的要求来要求它。在艺术形式上它有着自己的特点。它虽然是故事，但一般说来没有或没有明确的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只有人物和对话，叙事的部分很少。人物也往往只有姓名，性格单纯。对话一般也很简短，但语言简练，富于理趣或情趣，从这里面表现了人物的品质和修养，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塑造了人物的形象，从而也形象地突出了故事的主题思想。譬如《杂事》第一《晋平公闲居》章：

晋平公闲居，师旷侍坐。平公曰：“子生无目眈。甚矣子之墨墨也！”师旷对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与一焉。”平公曰：“何谓也？”师旷曰：“群臣行赂以采名誉，百姓侵冤无所告诉，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处高，不肖临贤，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奸臣欺诈，空虚府库，以其少才，覆塞其恶，贤人逐，奸邪贵，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国贫民罢，上下不和，而好财用兵，嗜欲无厌，谄谀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国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